

司马璐 编著

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第四部

中共与北伐



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第四部

中共与北伐

目 录

第一章 北伐进展与中共

- 第一节 北伐进展大势…………… (1)
- 附录：论国民政府之北伐……………陈独秀…………… (5)
- 北伐开始时中共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
 ——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政
 治报告（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
 八日）…………… (8)
- 中共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15)
- 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与国民党关系问题
 议决案
 ——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
 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28)
- 第二节 北伐期间的共党策略…………… (34)
- 附录：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宣传部的工作议决案
 ——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
 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38)
- 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
 ——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
 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39)

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	（46）
第三节 北伐与中共军事表现……………	（65）
附录：中共第一支武装部队——独立团……………	
……………周士第……………	（70）
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军事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77）
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79）

第二章 北伐与群众运动

第一节 北伐初期群众运动概述……………	（83）
附录：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88）
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学生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90）
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妇女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92）
革命与民众……………陈独秀……………	（95）

第二节	北伐初期的工运	(102)
附录:	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 ——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 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105)
	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济难运动议决案 ——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 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113)
第三节	早期广东的农运	(117)
第四节	北伐初期的农运	(122)
附录:	北伐开始时中共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 ——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 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126)
	北伐时全国土地占有概况	谭平山(134)

第三章 占领武汉后的纷争

第一节	鲍罗廷准备对蒋摊牌	(138)
附录:	最近中央特别会议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 决案	(141)
第二节	党权与军权之争	(148)
附录:	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	陈独秀(152)
	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 的讲演以后	彭述之(158)
第三节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167)
附录:	国民党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	陈独秀(171)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	

题.....(175)

第四章 上海暴动与占领南京

第一节 上海第一次暴动.....(181)

附录: 上海三次暴动(上).....
.....《共产国际》月刊...(185)

第二节 上海第二次暴动.....(195)

附录: 上海三次暴动(中).....
.....《共产国际》月刊...(198)

上海总同盟罢工与其前途.....罗亦农...(208)

上海第二次暴动时陈独秀致吴稚晖信.....(210)

第三节 上海第三次暴动.....(214)

附录: 上海三次暴动(下).....
.....《共产国际》月刊...(218)

第四节 北伐军占领南京.....(232)

附录: 宁案(南京事件)调查纪实...国闻周报...(236)

第一章 北伐进展与中共

第一节 北伐进展大势

一九二六年三月，广州事变以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对国民党让步。中共领导的表现，予人以一种“国际工具”的印象；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当初一切听命于共党，在实力上竟弱不禁风，蒋介石大刀阔斧的行动，一举成功，自此，蒋介石的领导威望大为提高。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条件也渐次成熟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七月九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其时，国民革命军的阵容如下：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主要的进军路线计分：一路进军福建、浙江，一路进军江西，一路沿着粤汉路向北推进。进军以前，唐生

智原任湖南督办，准备驱逐湖南省长赵恒惕，赵任唐为内务总司长，使代省长职权，自己旋即离去。三月十七日唐率军至长沙，二十五日就职，下令免第三师叶开鑫师长职，叶即向汉口吴佩孚求援，吴令陈嘉谟之第二十五师援湘。五月一日，唐生智被迫退出长沙。六日唐在衡阳就国民政府第八军军长职。国民革命军的先头部队，也以援助唐生智为理由，早在五月间进入湖南。

北伐时，据张发奎估计，当时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北方军阀合约四十万人。力量对比一比四。（注一）蒋介石估计北洋军阀包括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力量在内，国民革命军“远不如北洋军阀十分之一。”（注二）蒋介石对于北方军阀，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据董显光记述，“公（蒋介石）为破敌计，所取口号为‘打倒吴佩孚’‘与孙传芳合作’及‘不理张作霖’。”（注三）

国民革命军对北方军阀的统战与分化十分成功。“北伐开始的时候，由于首先攻打吴佩孚，孙传芳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吴佩孚的主力被打垮以后，孙传芳开始对北伐军采取敌对行动。”（注四）但孙传芳开始行动的时候，已经太迟，形势对他不利。

国民革命军的进展，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占长沙。八月二十二日占岳州（岳阳）。八月底，在汀泗桥和贺胜桥大胜，击溃吴佩孚主力。九月七日，占汉口、汉阳。九月二十日占南昌（后退出）。十月十日占武昌。其时，吴佩孚的主力部队虽被打垮，孙传芳却对国民革命军展开新的战线；九月上旬，国民革命军从湖南向江西、从广东向福建同时进兵。十一月间，孙传芳的主力部队

在九江、南昌也被打垮。国民革命军十一月四日占九江，十一月八日再克南昌。

中共领导当局最初对于国民革命军之北伐，估计过低。北伐以前，陈独秀说：“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问题，不是怎样进攻，乃是怎样防御。”“防御反赤势力之扰害广东。”“现时国民政府的职务，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注五）北伐进军时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加伦将军也提出，北伐军祇能在中原缓缓推进。能攻下武汉，已经是了不得了。后来战局急转直下，完全出乎中共与苏共的意料所及。因此，国民革命军内部争夺胜利果实也提前出现了。

据蒋介石记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本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时驻南昌，主持戡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份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对本党（国民党）的分裂行动，我（蒋）为了保持本党（国民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国民党）三中全会得以举行。”（注六）

国民革命军克南昌以后，朱培德、白崇禧、程潜被任为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朱培德代理主席。据国民党史料，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蒋总司令在南昌召集军务善后会议。”“三日，南昌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京。”（注七）

广州事变以后，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协助蒋介石排除国民党内的障碍，使蒋顺利地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根据陈公博回忆，张静江（人杰）出任国民党中委会代理主席，曾经由鲍罗廷代为说项；但是，国民党中委会主席汪精卫并未正式辞职。后日有“迎汪（精卫）复职”之争。导演张静江出任国民党代主席的是鲍罗廷，后日导演要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又是鲍罗廷。

在福建、浙江方面，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国民革命军占福州，不三月而占福建全省。一九二七年一月，何应钦、陈季良、方声涛被任为福建临时政治委员，何应钦代理主席。但在浙江方面，浙江省长夏超受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职，为孙传芳部击败，夏超身死。其后，国民革命军攻入浙江，一九二七年二月张静江（人杰）、蔡元培、经亨颐等被任为浙江政治委员会委员，张静江任主席。一九二七年三月，陈调元、程潜、蒋作宾、朱培德等被任为安徽政治委员会委员，陈调元任主席。

中共史学家缪楚黄评价国民革命的北伐说：“总计北伐军自出师以来，前后不过十个月，就歼灭了数倍于自己的军阀部队，从广州一直打到武汉和上海、南京，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占领了半个中国，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反革命统治。”（注八）

关于冯玉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中所担任的角色，由于其间变化富独立性，将另有专节记述。

在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四届扩大二中全会。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在于，从北伐开始时，中共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判断，

作出了对于北伐发展的估计，作成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基本上决定了北伐前期中共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方针、群众运动的政策。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给中共带来很大的利益。邓中夏说：“北伐是中国革命过程的一件大事，因为有了北伐，使中国革命发展到最高度，革命领土扩张到长江流域，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很迅速的得到长足的进步。”（注九）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共四大时，仅有党员九百五十人左右；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五大时，已有党员五万七千九百余人，差不多发展了六倍。

中共在北伐期间的收获，又显然大大超出于共产国际的估计。斯大林说：“因为广东军（国民革命军——马注）的推进，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给予全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予工人的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注一〇）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又产生另一种乐观情绪。

文献与重要参考资料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陈独秀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

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谈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而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及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样呢？在这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在第二点，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之幻想。在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在第四点，国民政府之北伐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徵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政策总不应该

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军之溃败，对农民政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若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则我们在野党应该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帝国主义者早已定下了吴张分途讨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如此英吴日张分据南北，才能和缓他们当中的冲突，现在英吴对日张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则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无论对国民军作战胜败，都必得张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吴佩孚一回汉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这样危险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丝毫不容我们忽视。

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

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将陷于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军正为此和军阀战争，也就是革命军和军阀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覆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原载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响导”第一六一期）

文献与重要参考资料

北伐开始时中共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

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通过的

中央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一、去岁扩大会议至现时政治状况的变迁 与我党在各时期的政策

自去岁十月扩大会议至现在，九个月间的政治变动，可分为三个时期，每时期，我们均有不同的策略，这三个时期

的分划是：自直奉战争至郭松龄反戈为第一时期；自郭松龄失败至国民军退出北京为第二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北京至张、吴会面为第三时期。

第一时期，是军阀政权动摇时期，在此时期中，奉系军阀已经溃败，皖系军阀没有实力，直系军阀犹未起来，帝国主义者，一时亦失去驭制各派军阀之能力，表现非常恐慌，段政府极力勾结国民军，吴佩孚亦向国民政府示好，彷彿南之国民党与北之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在此时期中，本党的策略是自孙传芳反奉军事发动，即提出扩大此次战争性质之口号，说明反奉战争应该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集合一切革命力量于反奉旗帜之下，这个宣传，在民众中是发生很大的影响，并深入军阀的队伍中去，于是有郭松龄之反戈，本党同时又提出，反对直系护宪运动，防止奉直联合之口号，盖已预见直系得势，必然护宪，奉系若败，必力求与直系妥协，企图军阀统治的政权，即今回视过去政策，一点都没有错。

第二时期，是帝国主义者想消灭此革命高潮，一方面努力促成英、日、吴、张军事上的反赤联合战线，一方面在民间造成广大的反赤宣传，遂将此革命胜利打消下去。在此时期中，我们的策略是要先破坏反赤的联合战线，所以主张在北京暂时成立一灰色的政府，可以容纳皖直两系参加，专门对奉。但此策略终未实行，而吴佩孚已在汉口发动攻豫，遂又主张广东速出兵讨吴，然结果此策仍不能行。所以如此原因，是由我们党的政治力量还不很强大，故虽有好的政治，仍不能影响国民党、国民军充分实现。

第三时期的重要现象，是一方面军阀政权重新稳定，一

方面是英、日、张、吴暗潮极烈，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实际出兵北伐，英、日、张、吴间冲突虽很严重，但国民军还是有力的存在，奉直咸有戒心。所以祇是暗潮，而未进于明显的破裂，在此时期中，我们政策，在北方是和奉反直，在南方是援湘御吴。北方的反赤军（奉、直、晋三方）若能一致合作进攻国民军，则国民军很难存在，但三方合作均无十分诚意，各有私图，故国民军似不至于失败，然在奉、直间无大变化时，国民军亦祇能自保而难于冲出，南方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祇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北伐。

总之，目前军阀政权的稳定，只能在国民军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得到很短暂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决不能持久的。

二、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

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最有权威的是英、日两国，现时他们共同的目的，是讨平南北二赤，其不同的意见是对于关税会议，日本因欲得关款增收，以整理西原借款，主张继续；英国因增收影响于英货之输入，遂想拖延，又在对于军事问题上，英的规模很大，有囊括全国的野心，日本则偏重东三省一隅，量力而进，没有英国这样夸张。

除英、日帝国主义政策之外，在中国影响较重要的，要算美国帝国主义政策，从表面看去，美国人现正计划帮助中国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之可怕侵略，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和平发展实业的要求，反对不能满足中国人民愿望的关税会议，然而他的目的，就在用大美国资本的道威士计划来代替英、日的统治。

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因为英国在华的势力根深蒂固，领域极广，日本祇是一部分，美国更无固定的地盘，所以尚利用其相互间之冲突，利用分裂的政策以破坏其联合。

三、各部分社会力量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

在民族革命过程中，我们应知道社会各部分力量及其趋向，现时中国社会各部的力量，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新士绅如大学教授等）之反赤运动，这都是反革命的力量，是结合于帝国主义势力的。

第二种是工农学生的革命运动，这是新的革命势力，刚与第一种旧的反动势力正对抗。

第三种是中小商人之反抗运动（如抗捐抗税等）。

第四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在现时尚多未脱尽买办阶级的思想，但他终将随着产业之发展而日渐分化，他与买办阶级对帝国主义不同的态度是一为无条件的合作，一为有条件的合作，换言之，即他想向帝国主义要点东西，得到之后便可与帝国主义妥协，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很难独立发展的，因为帝国主义不容许其这样做，资产阶级现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未来也是一种反动的阻力。

在以上四种力量中，我们将用何种力量来革命呢？当然的，祇有第二种工农学生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第三种中小商人，帝国主义经济上之压迫，苛税杂捐之剥削，祇有感觉革命之必要，并无反对革命之必要，工农方面应该拉到他们，才能免自己陷于孤立。第四种资产阶级，因感中国经济为外